

中国古代名著今译丛书

十家注孫子兵法譯注

□盛瑞裕

李崇立

汪超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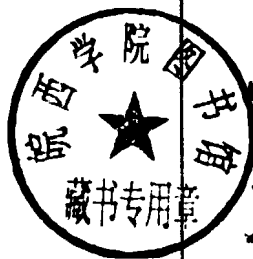
注译

備者深矣仰德風動
聲風動合生鏡如何不
把注并寫為是無人姓先
鍾 唐寅



中国古代名著今译丛书

十家注 孙子兵法译注



盛瑞裕 李崇兴

汪超宏 注译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(吉)新登字 07 号

Shíjiāzhù Sūnzǐbīngfǎ yì zhù
十家注孙子兵法译注

盛瑞裕 李崇兴 注译
注绍宏 张建国

责任编辑：李本达

封面设计：余力

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24.5印张 5插页 588千字
(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 136 号)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长春市第十一印刷厂印刷 印数：1—8 000 册 定价：32.00 元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ISBN 7—80528—914—X/I·179

前 言

我们中华民族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，积累了至为丰厚的珍贵遗产。举世公誉的兵学圣典《孙子》，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之一。

(一)

《孙子》今存十三篇，署为孙武撰。

孙武为春秋末期人，据《史记·孙子吴起列传》载：孙子武者，齐人也。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，阖闾尽观其所进十三篇后，旋令以妇人试其效。孙武即教战于吴宫，斩姬肃纪，使中矩墨，阖闾知其能用兵，拜为将，参与吴国重大军事行动，西破强楚，北威齐鲁，显名于诸侯间。观司马迁所记，与银雀山出土汉墓竹简《孙子·见吴王》两相吻合，足知可征为信。

孙子家世，则考之《新唐书·宰相世系表》和宋人邓名世《古今姓名书辨证》而得知：孙武，字长卿，本系陈国公子陈完后裔，陈完避内乱于齐，受齐桓公信用，任为掌管手工业奴隶的工正，并改姓田氏，是为田完。田完五世孙田书，因伐曹有功，齐景公赐姓孙氏，是为孙书，食采于乐安。孙书有子孙凭，为齐卿，即孙武

之父。孙武作为累代将门之子、上层贵族之后，家庭的影响，环境的熏陶，无疑为他研习兵法并形成自己的军事思想提供了诸多有利条件，产生了积极的作用。

孙武生于公元前 535 年左右，与孔丘同时稍后。孙武生年史传无载，今人据《左传》和《吴越春秋》的有关记载比勘推算而来：《左传·昭公十九年》有孙书伐莒事，这一年即公元前 523 年，此时孙书尚能驰骋疆场，当在 55 岁以前。古人早婚，然祖孙年龄差亦在 40 岁以上，此时孙武则年不过 15，即生年不可能超过公元前 538 年。《吴越春秋·阖闾内传》记孙武进见吴王在阖闾三年，即公元前 512 年，此时孙武已成兵法十三篇，其龄则不可能小于 20 岁，故知孙武生年当在公元前 532 年以前。两者取中，而定为公元前 535 年左右。孙武出生地最大可能在其祖居的高唐附近之陈氏封邑，因为此时田书尚未伐莒受封，而工正之职似亦不便携眷定居。孙武在陈氏封邑生活到 12 岁后，方随家迁至新的采邑乐安，并改姓孙氏。齐景公三十年，即公元前 518 年，孙武年届 17，齐国大司马穰苴因遭潜发疾而亡，这事深深震撼了孙武，兼之彼时齐国在景公昏暴统治下，屡贱踊贵，民不聊生，而齐卿大夫高、国、隐、鲍四姓争斗更加激烈，遂顿生去齐之心。他环顾各国，见吴国败楚伐越，气象一新，正是施展才华、实现理想的最佳去处，便毅然奔往。

在吴都近郊，孙武结识了自楚奔吴的伍员，两人志趣相得，决定先隐居静观，以待时机。伍员隐于乌程，孙武隐于罗浮，相距甚近，估计不乏往来。此时，孙武主要从事整理和撰写兵法的工作。经过数年的艰苦努力，兵法十三篇得以初成，其时适逢吴王阖闾即位，任用伍员谋划国事，吴国一派兴旺景象，经伍员举荐，孙武受命吴将，在无数次的征伐中，充分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华，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，也不断丰富和完善着他的兵法杰作。

战争实践检验了他的兵法理论，而理性的光芒又导引着更新的实践，那身经百战的荣耀，无论是伐夷扰楚、伐交谋楚、潜师袭楚、联军破楚并直捣郢都、迫其迁都的伟绩，还是复谋伐齐、势胁中原的功业，都一再显示出孙子军事智慧的夺目光彩。而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对越战争，特别是在吴王阖闾重创身亡以后，孙武仍矢志不移，与伍员携手辅佐新王夫差，策划诈兵，终于大溃越军于钱塘，迫使越王勾践俯首称臣，从而赢得了战争的胜利。

经历了 20 年寒暑的戎马生涯，孙武磨练得愈加成熟、深刻。战后，他“进不求名”，甚至颇有功成身退之姿，然对于兵法的研究，则一如既往，情有独钟且精进不息。时光飞逝，公元前 484 年，孙武已逾知天命之年，一个沉重的打击使他如雷灌顶：挚友伍员因诤谏夫差而惨遭杀身之祸。一时历历往事涌上心头，经过痛苦的反思，面对严酷的现实，他对吴王的感情开始由热变冷，尽管同年吴国的艾陵胜齐和两年后的黄陵挫晋，他或许因尚未心如死灰而“与有力焉”，但毕竟已锐气大敛，非同往昔。怀着对伍员惨死的悲痛和悼念之情，终于立意复隐乡野，以修订兵法来了却余生。这当然为狂傲自信的新主夫差所不喜，悲剧也就势所难免了。

关于孙武的结局，史传虽语焉不详，然《汉书·刑法志》还是透露出消息道：“孙、吴、商、白之徒，皆身诛戮于前，而国灭亡于后。”由此可知，此四者均在所效命的诸侯国灭亡之前即遭诛戮。至于导致被诛的直接原因，考诸史籍：吴起佐楚、商鞅辅秦，均变法图强，卓有成效，唯因得罪旧贵族集团，分别在支持他们的楚悼王、秦孝公死后，失去新主信任，遭守旧势力反扑，惨死刑场。白起则在为秦昭王屡立战功、领赏受封后，遭相国范雎妒忌，因人主年迈昏聩，终被逼自尽。显然，孙武的情况也不例外，乃被吴王夫差所诛。至于导致诛戮的直接原因，或是因受伍员之祸牵

连，或是因身退不仕惹恼夫差，亦或因是前君重臣，新主难容而蒙祸。总之，结局决非善终。而其被诛时间，据班固所言推之，必在勾践灭吴之前，其最大可能是吴都被围的公元前475年前一、二年，享年不到六旬。巨星陨落，身后凄凉，据《越绝书·记吴地传》和唐代李筌《太白阴经》载：“巫门外大冢，吴王客、齐孙武冢也，去县十里。”且“子孙不传于嗣”。

(二)

《孙子》一书，体系完备，结构严谨，见地精辟，蕴含深邃，乃超越时代与地域，具久远深广影响之不朽名著。一部如此伟大的著作，竟是两千多年前我国春秋时期的产物，着实令人惊异不已，它既是历史的奇迹，又包含着必然的因素。

当时，华夏大地正处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转轨的历史时期，社会的大动荡、大变革，猛烈冲击着东周天子的宗主权威，一时间“礼崩乐坏”，诸侯蜂起，新兴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，列国间征伐兼并十分激烈，出现了多极化的战略格局，形势迫使人们极度注重军事，时代也急切地呼唤军事家尽快脱颖而出，并为他们提供好了驰骋纵横的广阔天地，孙武及其《孙子》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。

就个人原因而言，齐人孙武的故里齐国，是一个具有悠久兵学传统的大邦，曾经涌现出佐周灭商、传说著有《太公阴符》的姜子牙，提出“尊王攘夷”而富国强兵的名相管仲及其书《管子》，受命于危难、功勋卓著并有《司马穰苴兵法》传世的田穰苴等著名将帅。同时，我国西周时代出现的兵书《军志》、《军政》等，在兵学气氛浓厚的齐国大地势必引起人们的极大重视，至少在上层社

会被有识者广泛习诵。这些，无疑对孙武的兵书著述发生直接的积极影响。对照《左传》引述《军志》中“先人有夺人之心，后人有待其衰”和“知难而退”等语，与《孙子》中出现的“攻其无备，出其不意”、“将军可夺心”和“少则能守之，不若则能避之”等提法，便可以看出其中的承传关系了。而《孙子·军争篇》更直接引用《军政》中“言不相闻，故为金鼓；视不相见，故为旌旗”等语，则尤其充分地印证了这一点。此外，前代典籍中关于战争经验的总结，也给孙武的兵书撰述提供了丰富的养分。

若作更具体的探讨，在当时“学在官府”时风下，私家讲学尚未开始的封闭性社会条件下，学问的传播方式往往只有家族集团内部的授习，而具有深厚兵学传统且代不乏名将的军事世家齐田家族，自然给予孙武学兵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，使他于耳濡目染中自幼养成重视兵学且以此为荣的思想，并于经常的质疑解惑间不断巩固和加深他对军事理论的领悟，从而奠定下极为坚实的兵学基础。

如果说，奔吴以前是孙武的厚积阶段，那么，结识伍员、隐居罗浮期则是他的进发阶段。伍员身为楚国贵族的后裔，楚国同样是一个军事大国，尚武好战的楚人，在他们创造的楚文化中，无疑也包括了独具特色的军事文化，而伍员的出身、教养，以及他深富韬略的思想，必然在与孙武的交往中，产生明显的作用。孙武凭着敏而好学的态度，充分吸纳伍员的军事见解，形成南北军事文化的交融，从而更丰富了自身的识见。加之宏愿的敦促、隐居的便利和年轻的体魄，经过缜密的思考，终于在短短几年间使这部兵学圣典得以草成，并在进献吴王后开始了它的实践检验阶段。

我们说孙武进十三篇系草成之作，是因为他在一生中后40年左右的时间里，还在不断地修改、充实、完善，战争的实践和现

实生活的体验,使他成熟与深刻,而这一切又都顺理成章地反映到他的著作当中,如《作战篇》中的“夫钝兵挫锐,屈力殫货,则诸侯乘其弊而起,虽有智者,不能善于后矣。”当是伐越功成、勾践囚于阶下后,夫差得意忘形,丧尽警惕,一心举兵北上,争当盟主期间,孙武感到越国暗暗准备、时刻意图反扑的危险,怀着对吴国前途的忧虑而作出的科学评判。又如《火攻篇》中的“夫战胜攻取,而不修其功者凶,命曰费留。”则反映了作者在吴军破楚入郢以后,“不修其功”,造成军力资财的耗费而进行了深刻反思。

当然,在《孙子》的增益完善过程中,孙武在世时,自然出于他个人不懈努力的奉献,而身后情形,则因其书的价值和影响,吸引了众多的后学和信奉者,正如《韩非子·五蠹》中所记:“今境内皆言兵,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。”这些藏书之徒,于研习、领悟中,难免不运动笔墨,写下一得之见,这就自觉不自觉地充实和扩大了《孙子》,实际上则是孙武著书大业在文化传承与发展意义上的继续。其间,又因人人殊,表现为质量上的良莠不齐,但总体而言,经时代的接受与汰洗,仍属更广范围的《孙子》再加工,以致时至今日,我们已无法准确区分哪是真正的孙武原著,哪是后世获得社会认可的增益,故只能将今本全书视为一个完整的艺术品接受下来加以学习和运用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记的“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”之说,很可能就是后世再加工过程中一度出现过的实际;而汉墓竹简《孙子·用间篇》中的“燕之兴也,苏秦在齐”,显然不是孙武所能预知的后世之事,这岂不恰好露出了再加工的痕迹?此外,《孙子·谋攻篇》中有“故上兵伐谋,其次伐交,其次伐兵,其下攻城;攻城之法,为不得已。修橧轂,具器械,三月而后成,距闾又三月而后已;将不胜其忿,而蚁附之,杀士三分之一,而城不拔者,此攻之灾也”一段话,校之汉墓竹简,则无“为不得已”四字,而文气连贯,文意尤为显豁,突出了

“攻城之灾”的结论。由此可以推知，此四字系后人所书，明显窜入正文之批注。

作上述蠡测，还可以从先秦诸子成书的共性取得依据。孙武生活的时代，诸子初出，著作多为语录体，词约义丰，且有明显的“散”与“朴”的风格，缺少系统的归纳梳理，《论语》、《道德经》便属此例，而今本《孙子》则非然。且彼时之撰述则又普遍存在鼻祖奠基，形成基本思想，再由门人弟子和后学加工整理，或经后人转录、编纂，方才得以成书。甚至在基本定型之后，还常有时益之文汇入。孙武作为孔、老的同时代人，其著作亦势难超越这一规律。

再说，诸子百家之书，经秦火浩劫后，所剩寥寥。《孙子》命运如何？是侥幸得存一二先秦手抄秘本，还是如伏生述录《尚书》般涅槃重生，则已无从窥知。然今所见之本，无论其属旧抄抑或新录，均难俱符原书全貌确是可以想见的。更何况兵书非同儒、道诸籍，其本身表现出鲜明的应用性，是战争的产物，又向来归属于九流十家，习诵者亦多为用武诸公，故而窜易更其在所难免。加之战国以来人主争霸，历代政权更迭无不以战争为推动力，兵书作为用兵磁针、玉帐秘本，在征伐频仍的岁月，更因战局的万千变幻，为各色将帅及其文职人员杂入彼时经验教训之言。而这种情势，便决定了它形成定本之不易，作为《武经七书》之首的《孙子》，定型之艰当尤为突出。故定本之断，即使用十分严格的标准绳之，也不当早于曹魏时代，尽管我们并不相信杜牧肇端的“曹操删理《孙子》说”。

进而言之，随着世人注经之风的兴起，《孙子》以其巨大魅力势所必然地吸引着后代无数喜好兵经的注家，从而出现各色注本行世。这从现存最早的曹操《孙子注》一书的文字中足可采证。观曹氏注，其中至少有七次出现了诸如“或云”、“一作”、“一云”

之类的话头，而话头之后，则是注家引述他人注本之语。察曹操本意，很大可能是借此炫耀，以表现已注的手眼要高人一筹。可是，我们除了看到他这点外，还获得了可资为据的信息；即早在汉末时《孙子》就已经有远不止一二家的注本流传于世了。且引曹氏注文二则为例：《虚实篇》“以吾度之，越人之兵虽多，亦奚益于胜败哉？”曹操在此注道：“越人相聚，纷然无知也。或曰：吴越，仇国也。”这“或曰”后引述的文字，的确平泛肤浅，显见系摘自别本。又《九地篇》“禁祥去疑，至死无所之。”曹注此语乃“禁妖祥之言，去疑惑之计。”并紧接着写道：“一本作至死无所灾。”这“一本作”是提示读者细心辨析各本尚有文字之异，须细心品察个中意味，并明白透露了当时众本纷传的局面。

今就现存各种《孙子》注本观之：自曹操以降，可谓注家蜂起，代有为数可观之有注本行世，以适应彼时社会之需求。由此足见，本文加注，已构成一种新的有机整体，它可使古人之书得以跨越时代，克服知识和语言的障碍，继续以其思想精粹为用后世，这可谓注本时代的《孙子》。其间，南宋时集成的《十家注孙子》又开启了择精汇宏之途，它一经出现，便倍受世人青睐，至今虽已时逾八百余载，仍觉生意盎然，好之者不衰。在这个意义而论，《孙子》定本即以保守眼光视之，也不当前于此时此本。

(三)

《孙子》内涵博大精深，它的许多见解，因其中的合理内核，至今仍放射着真理的光芒。

首先，自然是他的军事思想。这思想，犹如一株参天大树，刚劲挺拔，枝荣叶茂，卓立于华夏文明的沃土。就像大树有主干和

枝叶一样，孙子的军事思想也可分析为主与从两个部分。

所谓主，就是全书全宗明义赫然在目的：“兵者，国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。”孙武认为：战争关系着军民的生死、国家的存亡，且“亡国不可以复存，死者不可以复生”。面对这一最高利益，作为战争的决策者，难道不该倾注心力、审慎处之吗？因此他明确写道：“故明君慎之，良将警之。”

那如何才能赢得战争的胜利呢？孙武在《计篇》的结束，用归纳性的语言提出“庙算”的方式，他说：“夫未战而庙算胜者，得算多也；未战而庙算不胜者，得算少也。多算胜，少算不胜，而况无算乎？”这种决策层的战争形势分析应当是周密而细致的，包括敌我双方的，并包含精神和物质等多方面的综合分析。为此，他提出了具体方案：“经之以五事”，即以“五事”为纲。这“五事”是道、天、地、将、法。其中“道”是第一位的。孙武的“道”，与孔、老的“道”均非同一个概念，它主要指战争的道义性，讲究的是能否顺应民心，他说：“道者，令民与上同意也。故可以与之死，可以与之生，而不诡也。”国君有了“道”，便是有德之君；他施行的政，便是德政；而高张德政大帜推行的战争，便容易得到军民的拥护和支持，举国上下便可能同心同德，而不惧怕任何艰险去实现战争的目的。至于何谓有道、有德？具体而言，在不同时代、不同条件下，标准并非一律。以孙武生活的时代为例，像商纣暴戾，民生水火，武王举兵征伐，便是卫道，称为有道伐无道；又如公元前684年的齐鲁长勺之战，当鲁庄公提出“小大之狱，虽不能察，必以情”时，曹刿当即肯定这种做法是“忠之属也”，是树德，尽管齐强鲁弱，仍可以一战，并以气势战胜了对方面，这叫做有德胜无德。看来，孙武已经十分清楚精神因素的重要作用了。

战争毕竟是严酷的，当战幕一旦揭开，战争宣告爆发，两军对垒，刀兵相接，就无可避免地会出现人员的大量伤亡和资财的

急剧耗损，这时又当如何处置呢？即怎样在实现战争预定目标的前提下，把伤亡和耗损降到最低的程度。为此，孙武提出了进攻速胜和自保而全胜的战略思想，他告诫道：“兵闻拙速，未睹巧之久也。”从而强调了“兵贵胜，不贵久”的速胜速决的战略思想。孙武还在分析了攻城之灾后总结道：“必以全争于天下，故兵不顿，而利可全。”这就是说：一定要用全胜的计谋争胜于天下，这样军队不会受到挫伤，而胜利则可以完满到来。对此，他还阐述道：“善用兵者，修道而保法，故能为胜败之政。”的确，修明政治，确保法制，是得以掌握战争胜败决定权的关键。

孙武的军事思想，还有他的最高境界，那便是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。他说得好：“凡用兵之法，全国为上，破国次之；全卒为上，破卒次之；全旅为上，破旅次之；全座为上，破座次之；全伍为上，破伍次之。是故百战百胜，非善之善者也；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。”要想达到“屈人之兵而非战”的美妙境界，孙武提出了可循之径，即“伐谋”、“伐交”，把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、外交斗争紧密有效地结合起来，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和敌方的不利条件，努力造成军事实力及其运用上的绝对优势，不失时机地运用政治、外交等多种手段，施之以压力，晓之以利害，瓦解和摧毁敌方抗拒的意志。

循着这个思路，我们可以感受到《孙子》这部中国古代的兵学圣典的作者，实在是一位真正的兵圣，他不仅知兵且善于用兵，还有一颗慈爱的圣人之心，因为“不战”毕竟更有利于最广大的民众，也更加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繁荣。

通过孙武论战的基本思想，可以体会到他对战争所持的一贯审慎态度，这一切归纳起来便是国家利益前提下的慎战弭兵。

所谓从，阐述的是如何“因敌制胜”的办法，它包括战争实施的原理、原则和方法。

孙武主张慎战弭兵，但丝毫不意味着放松迎接战争的准备。尽管如他在《火攻篇》中强调的“非危不战”，但是，一旦战争无可避免时，就要求立即针锋相对地作出积极反应，并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，以赢得战争的胜利，维护国家利益这一最高原则。

孙子曰：“知彼知己，百战不殆；不知彼而知己，一胜一负；不知彼，不知己，每战必殆。”这段话，孙武把它作为《谋攻篇》的结论，同时也是《孙子》全书中着意突出的实施战争的基本原理。

战争是敌对双方用暴力手段解决矛盾的形式，是彼与己相互冲突的最高和最后形式，因此，谁透彻地把握了彼与己两个方面，也就自然而然把握了战争的主动权。而对于“知”和“战”的关系，其实就是认识和运用的关系，要在不以人们主观意愿为转移的铁的战争法则面前，发挥人的能动作用，力求深知就里，打有把握的战争，用孙武的话来说就叫做“知胜”。纵观《孙子》全书，“知胜”的范围相当广泛，为了使自己“立于不败之地”，至少要“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”、“识众寡之用”、“知敌之可击，知吾卒之可以击”和知地形之可以战，同时还要“上下同欲”、“将能而君不御”，并能“以虞待不虞”。这才算真知，才能在“先胜而后求战”中稳操胜券。

世间万事万物，无不居于发展变化之中，而战局的极其复杂因素，则更表现出瞬息万变的特征。“因敌制胜”，就是要时刻掌握变化中的新情况，不断解决变化中出现的新问题，方能战而胜之。因此，在“因敌”的背后，便有一个权变的过程，它要求战争的实施者深明常与变的道理。常与变，究其实是互为辅存的二元统一体，所反映的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，它的内涵相当丰富，仅就《孙子》一书中提到的就有分数、形名、奇正、虚实、正合、治乱、勇怯、强弱、安危、佚劳、利害、攻守、众寡、迂直等等。且以奇正为例，孙武在《势篇》中写道：“凡战者，以正合，以奇胜。”他认为：

“战势不过奇正，奇正之变，不可胜穷也。奇正相生，如循环之无端，孰能穷之？”足见，奇正在用兵领域中的重要地位。而分数、形名、虚实等，有关军队的管理、组织、指挥的指导思想和“避实就虚”手法的运用，同样不允许稍有差失。否则，“因敌”便将大打折扣，而“制胜”也便流于空想了。

《孙子》还以大量的篇幅，具体阐释了如何“因敌制胜”的方法，从而突出了兵书的实用性质。其中，最为引人注目的是“五事”、“七计”。

可以说，“五事”、“七计”既是孙武所处时代进行战争的基本因素和条件，同时更是当时战争决策的重要内容，而且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，仍然显示着不容忽视的作用，甚至在当今立体战争中也还具有可观的借鉴意义。

“五事”之中，除道义、民心、德政这一首要问题外，还有天，即天时之阴阳、寒暑、时制；地，即战地之远近、险易、广狭、死生；将，将帅本身的素质、修养；法，法令、武器装备和军事训练的完善。其中，孙武尤其看重将的作用，正如他在《谋攻篇》中所说：“夫将者，国之辅也，辅周则国必强，辅隙则国必弱。”因此，他要求“将不可以愠而致战”，这是为将者应当具备的基本修养。同时要具有“合于利而动，不合于利而止”的判断能力，这就必须“知彼知己”，“知天知地”，“知诸侯之谋”，对客观外部的各种情况及其变化了然于心，而且还要精于“示形”、“任势”之道，具备“料敌致胜”、“通于九变”的指挥才能，养成“进不求名，退不避罪”的品质气度，并在“令素行以教其民”中“与众相得”，使士卒亲附，黎庶风从。在孙武看来，只有这样才算符合于为将之道，才是“智、信、仁、勇、严”兼备的优秀指挥官。

继“经之以五事”后，还须“校之以计，而索其情”，这便是“七计”，即“主孰有道？将孰有能？天地孰得？法令孰行？兵众孰强？

士卒孰练？赏罚孰明？”得此七者，又何恐而无胜焉！

当然，“知胜”尚待取胜，具备了充分的胜利条件，也还须在战争中去付之实现。因此，在“五事”、“七计”外，孙武细致地对战事作了多角度、多层次、多方位的阐发。诸如：如何“攻其不备，出其不意”，“致人而不致于人”，使“我专而敌分”，形成“以瑕投卵”的巨大军事优势等等。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强调运用灵活机动的战法，迅雷不及掩耳地给敌人以致命打击。

此外，孙子还通过对特殊地形的利害判断，说明了如何利用天然险阻以及借天时地利之便破敌的问题。如《行军篇》中用“黄帝之所以胜四帝”的战例，就给人深刻印象，且就其中“客绝水而来，勿迎之于水内，令半济而击之，利”一语品味之，这“半济而击”的提法，显然是对春秋时代泓水之战宋军败亡惨史的理论总结，明确告诉人们战场上无仁义虚名可沽，若不乘敌之危，非得等到敌人成列后方擂鼓挥军，那便只能成为宋襄公式贻笑千古、饮恨而终的蠢人。从而生动地阐明了战争的一大特性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《孙子》十三篇中，有两篇是专论特殊战法的文字：《火攻篇》与《用间篇》。

用火，在春秋时代，当是最大的毁灭性战法，同时又是最经济的武器，但“行火必有因”要讲究条件，“凡军必知有五火之变”，不可乱烧一气了之，对于火这种特殊的凶器，孙武告诫曰：“不修其功者凶。”

而用间，则又似乎不太光明磊落，但不用间，则无从“先知”敌情，以致“相守数年”，“日费千金”，这才是“不仁之至也”。孙武在此引用伊尹、姜尚等前贤为间功成的史实，证明行间是“兵之要”，为“三军之所恃而动”的法宝，从而奠定了后世间谍战的理论基础。

火攻与用间，是孙武军事思想又一精华，是他对春秋以来奇

诡战术吸收与发展的结晶。

孙子曰：“兵者诡道”。又曰：“兵以诈立”。以诡作言兵，在仁义的负面做足文章，非大智大勇者不能为，尽管历代对此时有微辞，然事实是它始终被兵家奉为一条不可动摇的军事原则，并逐步形成战争与军事谋略的基本理论，由此一斑亦可见孙武军事思想的透彻。

(四)

除军事思想外，从《孙子》书中，我们还可窥见蕴含其中的哲学思想、经济思想，以及系统思想和运筹思想等科学的思想火花，尽管它表现为一种朴素的、原始的、粗略的形态，且处于自发的阶段，但它毕竟出现在 2500 年前的春秋时期，则无疑是十分难能可贵的，更何况这位古代佼佼者的思想亮点，至今还能给予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呢！

其次，是他的哲学思想，其中包含着朴素的唯物论和原始辩证法的思想。其具体表现：一、反天命鬼神。在孙武眼里，“天”就是自然的天，是自然现象，并无茫茫之中主宰人类的上苍之意，他明确写道：“天，阴阳、寒暑、时制也。”“地有绝涧、天井、天牢、天罗、天陷、天隙，必亟去之。”兵家要了解的天道，就是自然规律和自然现象，是人世之道。而鬼神，而是虚幻无稽的概念，故而，行事“不可取于鬼神，不可象于事，不可验于度，必取于人，知敌之情者也。”否则，便会为鬼神所累，便可能贻误“国之大事。”至于“司命”，更被他借以自许，用来比喻军队的指挥者和敌人的克星。在巫覡盛行、卜筮风靡的时代，孙武不仅不为之动，而且敢于公开进行反对和嘲弄，这是十分可贵的。二、重政治因素。他把